

# 善的求索:道德合理性的向度及其达成路径

舒婷婷 刘云林<sup>\*</sup>

**〔摘要〕** 道德作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其功能的有效实现受制于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具体而言,这一合理性表现为与事理、情理和法理的契合。此三者,构成了道德合理性的具体向度。在事理上,要提升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对道德建设进行自觉反思,努力探究并昭示道德的内在依据;在情理上,要从“源头”上确保道德与情理的契合,将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培养行为主体情感和能力;在法理上,要对法治建设进行道德上的含义性论证,进而确立法律信仰和法律权威,并运用法治思维进行道德建设和实践。

**〔关键词〕** 道德;合理性;事理;情理;法理

道德作为对人之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其本身的价值实现程度受制于多种要素。其中,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在这多种要素中最为重要。只有当道德获得了内在的合理性,才可能因此具备实现自身的前置条件;而如果其在合理性上存在缺失,那么这种道德的价值实现将托诸空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关注道德的合理性问题,把握其合理性的向度,探究这种合理性的达成路径,乃成为伦理学研究和  
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 一、道德合理性问题的提出

道德合理性作为伦理学研究和  
社会道德建设中具有“元问题”意味的范畴,其本身的内在依据何在,这既关乎本问题的价值,也涉及研究的立论基础。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既缘于道德自身的特点,也由道德的价值实现需要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

首先,道德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关注其本身的合理性。从发生学的视角而言,道德缘于人们对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无不对未来社会充满美好的期待。而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努力创设各种必要的条件。其中,对人们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作出应该如何的规定,从而为理想社会的实现提供价值导向和人的德性方面的保障,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德条件。这意味着,道德作为人类为实现社会理想的产物,其实质是对人们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进一步而论,这种应然性又受制于道德本身的合理性。对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关于哲人王和理想国关系的

---

<sup>\*</sup>舒婷婷,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刘云林,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

论述对我们理解这一问题颇有助益。他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利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sup>①</sup>在这里,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哲人王的统治。而之所以哲人王的统治能成为理想国,是因为理想国的决定性要件是分配正义。而只有当具有智慧的哲人为王之后,才可能将各种利益加以合理地分配。柏拉图这一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在于,道德的应然性受制于自身的合理性。在道德建设中,无论是我们告诉人们应该信奉何种价值体系,还是告诉人们应该遵守何种行为规范,都必须关注其本身的合理性,并努力使人们确信这种合理性。如此,道德方能获得要求人们应该如何的资格,正是道德这一特点决定了必须关注其本身的合理性。

其次,道德的价值实现需要决定了必须关注其本身的合理性。道德作为对人们行为的应然性规定,其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实现状况,而这又必须以道德本身的合理性为前置条件。从静态的视角而言,道德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两个方面。价值体系作为一种对人们前行方向的引领,必须为人们所信仰;规范体系作为对人们行为路径的设定,必须为人们自觉遵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思想关系,因而它是一种精神——一种以指导人们的行为为目的、以形成人们的正确观念为方式和内容的精神。道德作为实践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价值,它是道德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sup>②</sup>从具体的结果而言,人们之所以在众多价值体系中信仰某种特定的价值体系,在众多的行为路径中依循特定的行为路径,其中虽然可能会受制于诸多外在因素,但其中的合理性肯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首要要件。只有获得了合理性,作为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道德才可能为人们自觉遵循。从动态的视角而言,道德的实现过程乃是在把握行为主体道德现状的基础上契合道德发展规律的有效回应社会价值期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理性既应该是人们的自觉意识,又是道德有效实现的制约条件。具体言之,只有对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素质现状予以准确把握,要求人们应该如何的道德规定才不至于出现偏差;只有准确把握道德的发展规律,社会的道德建设才能依循正确的路径;只有正确表达社会的价值期待,道德才能在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基础上有效实现自身的价值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基于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决,道德及其建设才可能获得合理性,从而也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一切,仅凭伦理学研究者和道德建设实际工作者良好的愿望显然是不够的,它离不开人们的理性和智慧,离不开人们对道德合理性的有效把握。只有当人们通过努力而使道德获得了合理性,道德的价值实现才是可以期待的现实。相反,如果不具合理性,道德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就难以契合行为主体道德素质之实然,就不可能体现自身发展规律和人的接受规律,就难以获得实现自身的必要的社会支持,从而道德的价值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实现。

再次,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关注道德的合理性。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不能离开具体的国情,包括传统文化这一国情。在传统中国,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要求首先表现为道德,其次表现为法律。然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社会忽视对行为规范价值审视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关注道德的合理性问题。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那里,他是这样来给出法治的要件的:“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sup>③</sup>并且,西方社会还存有一种以道德为法之内在精神和评判标准的自然法传统。这种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学派,在19世纪又和作为新兴法学流派的实证法学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论争。然而,颇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论争中,对立的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5页。

② 杨嵘均:《论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主题及价值目标》,《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99页。

两派却是“站在相反立场,论证着相同的善良初衷”<sup>①</sup>,即都在追求法的合理性。并且,坚守法的实质合理性的自然法学派和强调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证法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合理因素,而这一逻辑结果乃是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有效达成。从实际效应来看,上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解读和自然法传统以及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的论争对于西方社会规范建设的意义在于,当人们面对社会所确立的要求自身遵守的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时,人们首先要发问的是规则本身的依据即合理性何在。正是这,自然地形成了西方社会追究规则合理性的历史文化传统。

和西方社会追问规则合理性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更为看重的是规则的工具价值。无论是道德还是法律,其意义均源于它们对社会治理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其首要任务就是自觉接受道德和法律的规范,而并非将规则的合理性状况作为是否信守的前提条件。对此,无论是先秦时期儒、法之间的德治和法治之争,还是后来人们关于德、法关系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道德和法律作为工具,何者更为契合人性的特点,更能发挥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对于道德和法律的工具性理解的文化背景,是很难形成追问规则合理性的学术流派和思想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规范文化特点和作用的这一认知,启示我们必须自觉确立对规则的自觉审视或者说价值批判意识,这不仅为确立道德的合理性所必需,即使是对于道德的工具价值的充分实现,也是一种必不可少之举。

## 二、道德合理性的向度

既然道德合理性问题之于伦理学研究和社会道德建设极为必要,那么,又应该如何对其加以把握呢?我们认为,从结构而言,这种道德的合理性可以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个方面。所谓道德的形式合理性,是指道德在形式上与一定外在规定性的契合。具体地必须符合以下要件,满足社会的价值期待、符合具体的国情、在内容上具有完整性与和谐性。道德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实现、自由解放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而就这种道德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具体表征、达成条件或者制约因素而言,其又是道德契合事理、情理和法理的逻辑结果。正缘于此,道德合理性的向度就具体地表现为合乎事理、情理和法理。在这一问题上,我国法学家郭道晖教授关于法律合理性的论述对我们具有可贵的启示。他认为,任何立法,如果是从实际出发的,就必须包括从人情事理出发。法律要符合实际,就应当符合情理。“天理、国法、人情”是衡量事物的三维尺度。所谓“公道”,就是这三者的综合。<sup>②</sup>在这里,郭道晖教授说的是对于立法而言必须遵循的原则。其实,作为社会立法的道德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确立,也同样离不开对天理、人情、国法的关注和遵循。在伦理学研究和社会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如果我们将“天理”理解为真理,理解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将“人情”理解为人之常情和人伦道德,理解为做人的道理;将“国法”理解为法之精神和以法律形式出现的个人的外在行为规范,那么,这种对天理、人情、国法的关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极为必要。从而,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其与事理、情理和法理的契合就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这三者,自然地构成了道德合理性的三重向度。

### 1. 合事理

作为道德合理性的首要向度,道德所合之“事理”在本质上属于科学意义的“真”的范畴。从而,所谓道德合事理所体现的乃是人的主观认知对道德的客观真理性的准确把握。在人类社会的道德实

<sup>①</sup>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的关系及其实践解读》,《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sup>②</sup>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践中,由于道德体现的是处在一定历史背景中的人们因社会需要而做出的具有应然意义的超越现实的价值追求,因之,这种道德本身的真理性又具体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外在方面而言,表现为对所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要的准确把握;从内在方面而言,则表现为对道德行为主体和道德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知。所以从总体而言,这种道德合理性的外在表征就是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具体的道德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满足社会对道德建设热切的价值期待;内在要求就是符合行为主体对道德的接受规律,符合道德自身的本质、特点、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一种道德,如果和上述要求相契合,就获得了内在的真理性,从而也就具备了合事理所需的各项要件。

至于道德合事理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是为道德价值的实现提供人的认知基础。道德作为一种关于人们行为的应然性规定,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其实现需要各种条件。其中,人的正确认知是实施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没有人的正确认知,就不可能有自觉而积极的行动。二是基于道德特点的必要之举,是为了确保道德从“源头”上符合真。前已论及,从形式而言,道德体现的是主体具有主观意味的价值观念。正因为如此,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下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而即使是处在同一历史阶段和社会背景的人们,当其面对相同的认知对象,也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异的道德观念。<sup>①</sup>在道德建设中,必须注意到人们在道德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性。只有如此,方能既体现和尊重道德本身的个体性及差异性特点,又能获得最大程度的道德共识,汇聚最大可能的道德力量。

然而,在道德这种主观性的形式或者说表象下面,我们还应努力把握其客观性。人们常说的道德不能完全超越特定的历史,作为具有主观意味的道德之应然,其出发点乃是客观的道德之实然,就是基于道德这一特点的正确认知。这也进一步表明,作为道德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设定者,他们实际上是在将社会对人们道德素质的客观需要正确地予以表述。一种道德,其实质是人们所理想的社会伦理模式的具体反映,这是道德的特点和使命所在,也是人们的价值追求之所在。自然地,这就要求我们在设定这一社会伦理模式,尤其是确立相应的道德规范时,必须努力把握社会对道德的价值期待,从而使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客观上社会对道德的价值期待相一致。在这里,马克思关于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应该如何的论述无疑会给我们以有价值的启示。他认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sup>②</sup>在这里,马克思认为,立法的过程,就是立法者努力把握和准确表达社会价值期待的过程。其实,何止是立法者应该按照马克思的忠告进行立法实践,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者而言,也应该依循马克思所指明的这条不二路径。道德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生成过程,就是制定者把握和表达社会对行为主体道德期待的过程,是对道德的客观性的确认和应对的过程。这也意味着,道德乃是其设定者的“发现”而非“发明”,是对客观的社会道德需要的一种呼应,而这就自然地蕴含了基于客观现实的人们主观的道德认知是否符合事理的问题。

## 2. 合情理

作为道德合理性的重要向度,道德所合之“情理”乃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具体地包含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要件:就主体而言,既是个人之情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之为入之情;就价值论的意义而言,其所体现的乃是人的正常的情感需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所谓道德合情理就是指其契合入之为入的正常的情感诉求。至于道德合情理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为道德价值的实现提供深长的动力。道德作为对人们行为具有应然意义的规定,其本身的

---

<sup>①</sup>康德经典的“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和“人为自身立法”之言说,实际上都自然而逻辑地暗含了道德存在个体差异性的意味。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7页。

价值实现状况受制于自身所拥有的各种条件,并需要克服各种困难,排除各种障碍。这就不仅需要人们具有正确的道德认知,追求道德与事理的契合,而且需要人们在情感上的认同、相容。因为从逻辑上讲,道德建设乃是社会所设定的道德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通过外在的道德教育和启发人们内在的道德觉悟而为人们自觉信守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道德的情感和态度,决定着道德作为一种价值和规则实体,能否有效地转化为一种秩序状态,从而最终影响到道德价值的实现。一种道德,如果和人们在情感上难以相容,就不可能成为人们坚定的价值信仰和自觉的行为规范。果真如此,那不管我们如何重视所设定的道德之于社会生活的意义,也无论道德宣传教育工作者作出多少努力,道德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有效实现都只能是托诸空言。因之,人们的情感作为决定其对道德态度的重要因素,与道德的价值实现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追求道德与人们情感最大程度的契合,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

其次,由道德自身的特点所决定。从具体的指向而言,道德是对人们行为“应当”和不当即“失当”的明确规定。这种“应当”,表达的是对人们行为的引领和激励;这种“失当”则是对人们行为的限定,是对人们行为有所规制的自我立法和社会立法,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就价值意蕴而言,道德这种对人之行为的设定,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情怀。这是道德之“应然”,是道德成为善德必须彰显的特点。对于道德的这一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其与法律的比较而得到更为深刻的把握。在人们传统的认知中,法律乃是冷冰冰的规则汇编。其实,如果我们细细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得知,法律也有“温度”,也蕴含了一种深切的人文情怀。在法治进程中,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对于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于权利的诉求等一系列基于情感的要求,都在法律体系中得到了明确而具体的合理规定。不管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对公民情感的尊重和有效保障。在实体法中,婚姻法的价值追求在于满足广大公民对于幸福家庭生活的情感需要,民法的价值追求在于满足广大公民渴望在人际交往中受到真诚对待的情感需求,甚至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专事惩罚、制裁的刑法,其实质或最终目的也是在于为了广大公民生活环境的稳定和谐,它也不乏深厚的人性之基础,也不排除对人的情感的尊重。法律的这一特点启示我们,作为以刚性的“必须”来规定人们行为底线的法律,尚且蕴含了如此丰富的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幸福的价值关怀,那么作为为理想社会提供价值导向和德性保障的道德,更应将符合人的情感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在要件。既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应人的情感实现的需求而产生,也就自然地逻辑上决定其必须最大程度体现对人的价值的关怀。

### 3. 合法理

在道德合理性的向度中,合法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从具体指向而言,这种道德所合之“法理”则是一个综合性的范畴,应该从法之内在精神和对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两个方面予以把握。黑格尔认为,“法律自在地是法的东西而被设定在它的客观实在中,这就是说,为了提供于意识,思想把它明确规定,并作为法的东西和有效的东西予以公布。通过这种规定,法就成为一般的实在法。”<sup>①</sup>黑格尔的意思是说,法律是将法规定下来,变成明确的规范,法是法律的实质,而法律是法的表现形式。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也认为,“法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sup>②</su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他所说的法的本质即事物的本质,是指法的理念如自由、理性等,法律应该反映法,否则就是非法,不是法。应该说,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仍未完全摆脱古典自然法学派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影响,但将法与法律进行区分,是他后来一贯的立场。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法”乃是本文所说的法理之主体。在我国,当下法学界也普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普遍认为,法理是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一定意义上是法的渊源。思想家们对法律 and 法理的这一理解启示我们,法律是其内在精神和外在形态的有机统一。作为法律,必然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精神,其构成了法理的实体;同时,这种作为法之内在精神的法理必须有所附丽或依傍,即外化为一种法律。因之,道德契合法理自然地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从“形而上”的层面而言,表现为与法的内在精神的契合;从“形而下”的层面而言,则表现为与法律规范的一致。此两者,构成了道德契合法理的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关于道德契合法理的必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为道德建设所处的法治背景所决定。当代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中华民族历史上全新的治国方略,内在地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法之精神和法律规范的契合,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因为,从动态的视角来看,法治建设的过程乃是蕴含一定法之精神的法律规范为全体公民自觉信守的过程。从这一意义而言,关注法治背景就自然地表现为对法之精神和法律规范的信守,这是对法治背景下的全体公民和所有活动的要求。而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自然地必须与时俱进,这既由道德的本性使然,也为道德的价值实现需要所决定。一种道德,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难以体现之于时代的重任,从而也就难以有效实现自身的价值。由于道德的价值指向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确立内在价值信仰基础上的心灵善,二是在信守外在规范基础上的行为之应然;而法治目标的达成也相应地受制于或者说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之精神内化为人的价值信仰,二是这种价值信仰进一步外化为对法律规范的信守。因此,这种道德和法律价值指向和实现表征的一致性,就自然地、合逻辑地提出了道德契合法理的具体要求:作为人们所信奉的价值体系,道德必须体现和法治价值指向的一致性;作为一种规范体系,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固然会有差异,甚至有时会发生矛盾冲突。但是,这种差异仅仅限于因为人们境界的不同而表现为追求层次上的不同,这种矛盾冲突也仅仅是一个个案。也就是说,在总的指向上,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无疑应该是一致的。

其次,是实现法治和道德建设目标的内在要求。这意味着,道德契合法理是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要求,对于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双赢”的意义。首先,这是法治目标的实现需要。就外在的制约因素而言,法治的实现需要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的道德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软实力,道德不仅可以为法治的有效实现提供价值导向,也可以为人的行为设定与法治指向相一致的伦理路径。而道德这些功能尤其是后者功能的发挥必须基于自身与法治指向的一致,即道德本身与法理相契合。如果道德有悖于法理,就必然会对法治进程产生一种阻滞作用。其次,这是道德建设目标实现的需要。如果说,道德对法治的意义主要表现为对法治的一种有力支持的话,那么法治对道德的意义则在于对道德的一种“反哺”,具体表现在为道德价值的实现提供社会认同和法律保障。法之实现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必要前提,也是道德实现的基本诉求。因为,在一个法治不彰的社会,必定也是一个道德受到践踏的社会。正因为如此,法律乃是道德的守护神,遵守法律就是对道德的最根本守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法治对于道德目标的实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的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促进、同向而行的正相关关系。

### 三、道德合理性的达成路径

上文从道德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角度,论述了道德合理性的三重向度,即合事理、合情理、合法理。那么,如何才能合事理、合情理、合法理呢?也即,道德合理性的达成路径。

#### 1. 如何合事理

首先,提升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从道德合事理的主要表征或者说达成条件而言,其实质上



是对客观存在的道德真理的把握。一种道德,要使自身符合事理必须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主体对客观存在的道德真理予以准确把握,二是必须将这种道德真理有效转化为现实,如此方能体现道德与事理的契合。对于前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道德真理不会自然地呈现于人们面前,它需要人们去探索 and 发现。前已论及,道德并非是人们的发明而是“发现”,而这种发现必须以人们良好的认知能力为前提。进一步而言,这种被发现的道德真理也仅仅是一种道德之应然,其要有效转化为新的实然,还必须通过对道德实现的外在背景和内在条件的把握,正确设定其实现路径。上述两者,都必须以人的良好的认知能力为前提条件。相应地,要使得道德符合事理,就必须提升行为主体把握道德真理的认知能力。

其次,对道德建设进行自觉反思。从历史的视角而言,任何一种道德建设都是对道德现状的一种超越,而对这种已成过往的道德建设进行反思极为必要。原因在于,不仅是通过反思所获得的经验可以为社会的道德建设所借鉴,即使是失误,也可以提醒我们在接下来的道德建设中少走弯路,从而成为道德建设中的可贵财富。事实上,道德合事理的达成不是自动实现的,它和行为主体对道德实践不断进行的反思密切相关。没有反思,道德建设就难以不断超越现实,行为主体也就难以不断超越自我,从而道德就难以使自身与事理相契合。就反思的向度而言,针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实际,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决策上要反思道德建设目标和内容设置是否合理;在管理上要反思管理活动是否具有合科学性和合规律性;在教育上要反思教育活动是否符合决策者和社会的价值期待;在研究上要反思能否把握道德存在的本质问题,能否为道德建设提供启迪和导向作用。就价值指向而言,这诸方面的反思在于正确把握道德建设之“实然”和“应然”,包括道德建设未来的走向。这一“实然”主要体现在对行为主体道德现状的准确把握,正确认知社会对道德建设的价值期待。这一“应然”主要体现在应养成行为主体何种德性,道德建设应该如何回应时代要求,应该依循何种行为路径等问题。

再次,探究并昭示道德的内在依据。道德作为行为主体的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其内在依据应该成为伦理学研究工作者和道德建设工作者的关注点。在道德建设中,固然必须首先设定道德行为主体应当信奉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这种设定乃是社会道德建设中的首要之举。因为,道德建设的重要使命就是告诉人们应该信仰何种价值和遵循何种规范体系。然而,这种设定能否通过人们的自觉信奉而转化为一种现实状态,还受制于人们对这一设定是否认同。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道德建设的过程中,除了首先要昭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如何外,还必须告诉其为什么应该如何。按照悉尼·胡克的观点,人是具有自由理性和主体精神的高级动物,“他们即使在为活命而斗争的时候,也是在他们知道为什么或相信他们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才斗争得最卖力气。”<sup>①</sup>如果说,在人类理性认知水平比较低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依靠宗教神谕等外在强制手段尚可维持的话,那么在人类理性认知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的当今社会,没有人们对道德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内在合理性的认同,道德要求是很难内化为他们的信念,并进一步外化为他们的自觉行为的。这就启示我们,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作为研究者,必须关注和揭示道德的内在合理性;作为教育者,要进一步使人们确信这种合理性,从而自觉地接受这种具有内在依据的道德要求。这不仅是道德由应然转变为新的实然的重要步骤,也是传统道德教育向现代道德教育转变的重要表征。

## 2. 如何合情理

首先,对行为主体的情感予以道德的确认,从而从“源头”上确保道德与情理的契合。从价值论的视角而言,人之行为可以分为“应当”、“正当”和“失当”。在这三种行为中,“应当”和“失当”具有

---

① [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页。

道德的意义,无疑应成为道德评价的对象:前者是道德上值得肯定的行为,后者则是道德上应予否定的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量的行为则是与价值评价无涉即不具道德意义的“正当”行为。所以,在社会的道德建设中,我们除了应明确褒扬“应当”的行为,有力鞭挞“失当”的行为外,对于大量的属于价值“中间地带”,基于人的正常情感需求并与其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无涉的“正当”行为,在道德上应该予以认可。只有当这种基于人之情感的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关时,道德才有必要做出价值上“应当”还是“失当”的评价。在我国道德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将人们正常的情感诉求等同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等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这不仅导致了道德本身合理性的缺失,也因为道德缺乏实现自身应有的人的情感基础而严重影响到了实际效果,这一教训应该为当下的道德建设所记取。

其次,在目标设定上,应当将人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道德的最高价值追求。就社会道德建设的目标而言,尽管我们可以对此进行多视角的理解,但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设定为道德建设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在道德的终极价值追求上我们可以认定,道德建设就是为行为主体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事业。这种快乐,不仅源于行为主体获得道德意义的真知油然而生的豁然开朗之感,也源于行为主体对道德价值问题的领悟和认同所产生的情感愉悦。这种幸福,不仅因为道德所追求的社会进步和人际和谐本身就表达了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人们实现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也在于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学习,人们接受了科学的价值引领和行为规制,使自身行进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而这不仅有利于人们利益的实现,而且本身就是其最大利益之所在。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就当下而言,伦理学应该成为人们的快乐之学,道德建设应该成为一种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事业,应努力使得道德教育的过程成为被教育者情感愉悦的过程。被教育者不是被动地甚至痛苦地接受教育,而是主动积极地享受教育。达至这一境界,道德教育活动本身就获得了合道德性,也为自身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就长远而言,道德教育应该成为被教育者的“幸福之学”,即不仅应关注其当下的诉求,也应关注其长远发展,为被教育者的一生幸福打下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基础。这要求在教育活动中,无论是教育目标的确立,还是教育内容的安排、教育方式的选取、教育评价标准的设定,都必须围绕是否有利于被教育者获得幸福人生进行思考和实践。如能这样,教育就因其对于被教育者幸福的重要意义而成为道德善的事业。

再次,注重行为主体情感和能力的培养。就道德建设的目标实现而言,行为主体对价值体系的信仰和规范体系的遵守乃是其重要表征,而这又受制于诸多外在因素,其中,人的情感和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要件。换言之,道德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种情感,也需要一种能力,是基于情感和能力的逻辑结果。正如列宁所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sup>①</sup>有了这种情感,才可能产生对道德价值目标的热切追求,所以应在人的情感培养方面加以努力。同时,应注重行为主体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对自身角色和使命的把握能力和对道德价值体系辨识能力的培养。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行为主体的信仰才可能得以确立,其价值追求才可能体现真善美的意蕴。正是基于情感和能力对于行为主体信仰及行为习惯的重要意义,所以必须非常重视这两方面素质的培养,甚至将情感和能力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目标加以理解和实施,即重视其情感能力的培养。我们认为,这种情感能力具体地包括情感识别能力、情感调控能力、情感体验能力和情感沟通能力等方面。在这种情感结构中,情感识别能力是确立情感的认知基础,决定着情感的健康与否;情感调控能力决定着人的情感的“度”,从而影响到情感的具体路向;情感体验能力指向的是对情感的认知和感受过程;情感沟通能力则是主客体之间在情感上的互动、发送和反馈的能力。注意到以上方面,就能使行为主体健康的情

---

<sup>①</sup>《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5页。



感完成从孕育、发动、实现并且和“他”者尤其是和行为客体共享的过程,从而行为主体也获得了对道德内容信仰和依循的情感基础。

### 3. 如何合法理

首先,对法治建设进行道德上的合义性论证,从而为人之行为契合法理奠定人的价值认知方面的基础。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体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真理认识和价值认识。这种真理认识,是对客体的一种事实判断,具体表现在揭示客体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这种价值认识,是从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的视角对客体的一种判断。通过这种判断,人们对客体进一步做出是肯定还是否定、是追求还是拒斥的行为选择。这就意味着,对客体的价值认识是人们行为的内驱力。人们对客体的态度和行为如何,皆源于对客体的价值认同程度。自然地,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这一治国方略要得到广大公民的由衷肯定,既需要在法律创制阶段关注法之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从而使法律成为道德视域中的良法,也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的形式对法治进行合义性论证,使法治得到广大公民道德上的认同。要通过这种合义性论证,使人们确信我国将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是因为这种治理模式最能够确保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规范化,最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能够为广大公民应有权利的的实现提供有效保障。反之,如果不将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社会生活必将混乱无序,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将难以得到确认和保障。通过这种论证,我们将会使广大公民确信,法治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符合道德善的治理方式。而这种从价值上对法治加以积极肯定的合义性论证,将会为法治的有效实现奠定道义和社会情感的基础。

其次,确立法律信仰,服从法律权威。在法治进程中,公民是否信仰法律对法之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乃是其守法行为的认知和情感基础。只有信仰法律,公民才会油然而生对法律的认同感和愉悦感。对此,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法律史家伯尔曼无不深刻地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sup>①</sup>在法治建设中,如果说法律信仰是法之实现的内在保障的话,服从法律权威则是对公民外在行为的要求。应使公民确立这样一种认知:法之精神和道德价值体系具有同一性,一旦法之精神外化为成文的法律,就必然对社会生活具有普遍约束力,从而也必须为全体公民所信守。这种对蕴含道德价值体系的法律的遵守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道德的维护,是道德善的实现所必须的另一种形式。从具体表征而言,这种法之权威突出表现在公民对法律的无条件服从。即对于公民而言,无论他们对法律在理性上是否认同,也无论他们在情感上对法律是否接受,面对法律,他们的行为取向只应是遵守和服从法律。当然,这种公民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很有可能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公民的守法道德也主要表现为道德上的他律而非自律。进一步而言,这种法之权威还表现为在法治进程中,应明确回答当公民面对的法律在其价值视野中存在瑕疵时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这是研究公民守法时必须考虑的绕不过去的问题。按照守法道德的要求,即使公民面对的是带有瑕疵的法律,他们也必须努力遵守和服从,这是一种责任,也是公民服从法律权威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基于公民的使命和责任,他们还应该通过自身多方面的不懈努力,积极推动通过正常程序和途径修改法律,使其获得最大程度的合理性,从而为良法善治创设必要的前提条件。

再次,运用法治思维进行道德建设和实践。这具体地表现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行为的实施必须注意到法治这一外在背景的要求,不能逾越法律这一底线。要使人们确信,在现实生活中,对法律要求的遵从就是对道德善的积极追求,对法律的背离在道德上都应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哪怕是以道德的名义或者说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所做出的违法行为。之所以对人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现象并非鲜见。例如,在我国与某国因某些矛盾冲突而导致的涉外事件中,一些人为了表达

---

<sup>①</sup>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5—16页。

自身的爱国诉求和情怀,不惜损毁该国在华企业和产品,阻止人们消费该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殊不知,这种打砸物品的行为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一种侵害,而阻止人们接受外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正是对消费者自由和权利的一种侵害。正基于此,必须提出道德建设和实践的法治思维问题。要使人们在理念上达到这样一种自觉,即法治国家的法律是社会主导道德的一种“转型”,其本身就蕴含了深深的道德意味。从而,对法律的背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对道德并且是对社会主导道德的背离。依据这一思路,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对规则的有效遵守,不仅为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所必需,而且本身就是道德善的题中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杨嵘均)

## Seeking Goodness: A Dimension of Moral Rationality and the Way for Its Realization

SHU Ting-ting, LIU Yun-lin

**Abstract:** Morality is a value system and code of conduct that people should follow in their daily life and its effect is determined by whether it is justifiable or not. Whether a moral principle is acceptable or not is in turn determined by whether it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truth, based on good reasons and in line with the law. These constitute three concrete dimensions of good morality.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its agreement with the truth, we should enhance our ability to master the justifiable moral principles, reflect on our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and do our best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morality. In terms of whether it is based on good reasons, we should make sure that our morality is at first in agreement with justifiable reasons, and our happiness and contentment is set as the ultimate value orientation of morality when cultivating our good 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moral ability. In terms of its agreement with the law, we should first make 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morally justifiable and then establish our belief in the law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system and the practice of moral principles guided by a good sense of the rule of law.

**Key words:** morality; rationality; agreement with the truth; having good reasons; agreement with the law